

·学校体育·

民国教会大学的体育实践：以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赖昌南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发展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选取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这两所代表性的教会大学为考察对象, 梳理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体育实践历程, 阐述教会大学对我国高校体育的影响与历史贡献。教会大学在新式体育进校园、校际体育交流、区域体育竞赛、体育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对我国体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教会大学的体育实践经历了非正式向正式、非结构化向结构化、自主活动向课程教学的转变, 划分为“鼓励体育运动”“普及体育运动”和“课程教学”3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 大学体育; 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 燕京大学

中图分类号: G8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3)06-0104-06

The sports practice of church universit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centers around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Yanjing University

LAI Changnan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two representative church universities, namely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Yanjing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s to sort out the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e process of church universi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elaborate on the influence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church university 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work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urch university has actively explored new forms of sports on campus, inter school sports exchanges, regional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sports teaching practices, which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e of church university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informal to formal, from unstructured to structured, and from autonomous activity to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also divides into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encouraging physical education," "popularizing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Keywords: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hurch university; St. John's University; Yanjing University

教会学校在引入和推广新式体育方面发挥着先导作用, 教会大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据统计, 民国时期共有 24 所教会大学, 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北地区, 其中华北地区的燕京大学由多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 为华北教会大学的集大成者。华东地区的主要教会大学有“华东八大学”之称谓, 圣约翰大学是其中的翘楚。此前学界对教会大学的体育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 一种是对单个教会学校的体育史研究, 这种范式囿于偏狭, 难以把握教会大学体育实践的总体脉络;

另一种是面向整个教会学校的体育史研究, 这种范式聚焦不足, 叙事性存在欠缺, 不足以凸显特定学校的作用与历史价值。研究选取具有区域代表性的两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作为考察对象, 按照一定的逻辑理路梳理教会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 穿插横向对比的方式呈现两所大学的引领性体育实践, 以此洞察两所大学对区域体育实践和高校体育教育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收稿日期: 2022-12-27

作者简介: 赖昌南(1981-), 男,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教育史、教育管理。E-mail: 24291102@qq.com

1 教会大学的体育实践

1) 新式体育进校园。

众多教育家曾经提倡“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1]，把身体健康视作精神健康的基础。教会大学承袭西方教育传统，重视体育，率先将西方新式体育引入校园，其目的有二：一是练就学生强健的体魄，这一点从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办学言论中可以找到线索。二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向上、团结合作的精神”^[2]。

研究表明，地处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我国最早将西方新式体育引入校园的大学^{[3]294}。这些新式体育以田径、集体球类项目为主，也包括拳击、击剑、赛船等个体竞技项目。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正式更名圣约翰大学。该校具有体育传统，曾于1890年举行第一次田径运动会^{[4]113}。这是有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学校田径运动会。其后，圣约翰大学又相继于1896年举办足球比赛，于1898年开始举办网球比赛^[5]。此外，该校还陆续开展拳击、赛船、击剑、垒球、橄榄球等运动。圣约翰大学开启了我国大学田径运动会的先河，是校园体育实践的开创者。地处北平的燕京大学也是校园体育的早期实践者，该校由4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于1919年正式创办，先后引进“四大球”：网球、棒球、羽毛球、橄榄球^{[6]108}。学校还组织滑冰比赛，推广冰上运动，冰球是燕京大学的一大特色。随着校园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校内体育组织应运而生，圣约翰大学于1898年成立“学生体育会”，负责开展体育活动与比赛。燕京大学的学生体育组织众多，“每种体育组织设组长一人主理其事，其活动对内则有学院、宿舍、公开及混合何种比赛”^{[7]74}。学生体育组织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新式体育在校园的传播与普及。

2) 校际体育交流兴起。

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是民国时期高校云集的两大区域，其中华东地区以上海为代表，华北地区则以北平(今北京)为代表。随着校园体育活动的兴起，区域内的校际体育交流越来越多。

华东地区的圣约翰大学与南洋公学举行有资料记载的最早校际足球对抗赛，该比赛肇始于1902年，一直持续到1926年^{[8]112}。据统计，仅1926年9月—1927年3月，圣约翰大学学生就参与18场校际体育比赛与交流^{[3]297-299}。圣约翰大学积极参与校际体育活动，包括跨国交流，1924和1926年，圣约翰大学和东京圣保罗大学在上海及东京两地进行了篮球对抗赛^[9]。校际体育比赛已成为圣约翰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公共活动。圣约翰大学是华东地区校际体

育活动的枢纽，推动体育交流，输出体育文化。

华北地区的汇文大学与华北协和大学于1904年举行首次校际体育竞赛^{[10]168}。燕京大学由4所教会大学合并组建，继承华北女子协和大学重视体育的传统，是华北地区校际田径运动的参与者和促进者。燕京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之间的体育互动频繁，交流比赛项目包括足球、网球、排球、篮球、冰球和乒乓球等，燕京大学在篮球、足球等集体项目上表现出色。1928年《晨报副刊》刊载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冰球比赛的消息，这是有记载最早的校际冰球比赛。

3) 区域体育竞赛蓬勃发展。

校际体育活动兴起之后，高校之间的体育交流逐渐演化成体育竞赛，并成为校际学生交流平台与荣誉争夺的阵地。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是各自区域校际体育竞赛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推动区域体育组织的成立和运作，是当时高校竞技体育的重要推手。

在华北地区的由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北平五大学体育会”“华北大学体育联合会”等区域体育组织，先后举办“五大学田径运动会”和“五大学足球联赛”，篮球、足球、网球、田径竞赛日益兴盛。燕京大学的足球队经常参加城市足球锦标赛，有较高知名度，其篮球队是华北地区的佼佼者，队员曾作为主力代表北平夺得全国篮球比赛冠军。网球也是该校强势体育项目，在华北地区的网球比赛中屡获桂冠。燕京大学还是北平冰球界的老牌劲旅，曾在1930年的华北冰球联赛上夺得桂冠，该校还与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联合发起“北平五校联合冰球锦标赛”^[11]。

在华东地区的“中华大学联合体育会”“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先后于1904、1914年成立。这些组织在推广体育竞赛中发挥平台作用。圣约翰大学是上述体育组织的发起高校之一，在“中华大学联合体育会”赛会机制下，圣约翰大学自1904年起连续5年参加本地区教会大学校际田径赛。1910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诞生，并于当年举办“中华全国学校分区运动会”，圣约翰大学获学校组总分第1名^{[3]295}。1917—1921年，圣约翰大学曾连续5年取得华东各大学网球锦标赛冠军^{[3]15}。1923年12月，圣约翰大学参加“第一届华东大学足球赛”并展现出强大竞技实力。体育竞赛逐渐成为各大学竞逐学校荣誉的重要途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4) 体育教学实践。

出色的竞技体育成绩使圣约翰大学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但燕京大学在体育教育教学上的探索更为系

统和前沿。教会大学的校园体育经历了从非正式到正式、从自主活动到课程教学的演变,总体可划分为“鼓励体育运动”“普及体育运动”和“体育课程教学”发展阶段。

(1)鼓励体育运动阶段。初期,教会大学只以课外自主活动的形式开展体育,学校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圣约翰大学学生一开始并不接受西式体育。卜舛济曾说:“当我提议在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时……碰到极大困难,后经校方解释和引导,师生们认识到这些体育活动只不过是古代习俗的恢复”^{[1]15},其后,师生们逐步加入体育运动,学校引入各类西式体育项目并鼓励学生参与,使体育成为圣约翰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广体育,燕京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做法相似,一是举办学校运动会。运动会前夕,圣约翰大学“每一位班长都想尽办法组织他的代表队参加训练,整个学校都行动起来了”。比赛当天,“所有家长都被邀请来观看运动会”^{[1]2}。燕京大学的运动会,不仅比拼单个运动员的实力,还以系为单位决胜负。二是营造校园体育文化。做法包括在体育竞赛现场营造节庆气氛,出版体育刊物等,如圣约翰大学的《约大体育》,燕京大学校报的“体育副刊”,旨在普及体育知识,营造体育氛围。三是表彰优秀运动员,圣约翰大学“颁发体育运动奖项共八项”^{[1]3103},以“激励获奖者的荣耀感和进取心”^{[1]466},燕京大学每年颁发“全能杯”和“体育道德杯”,由校长亲自颁奖,前者旨在激励学生参与多种体育运动并力争上游,后者意在引导学生公平竞争、敬畏规则、尊重对手。

(2)普及体育运动阶段。西式体育项目逐步为学生接受之后,教会大学的学生体育快速走向普及。圣约翰大学自1921年起实施学生两年强制运动制度,每天的课外运动时间,学校关闭所有宿舍、教室和图书馆,让学生走出教室参加体育锻炼^{[1]296}。圣约翰大学校内有为数众多的体育社团,引入“体育赛季制度,10月是棒球赛季,11—12月是足球赛季,篮球赛季是3—4月,棒球和田径是4—5月,网球是5—6月初”^{[1]467}。“体育赛季制度”既是圣约翰大学普及体育的方式,也是该校体育普及开展的重要表征,普及还表现在该校为数众多运动队伍上,据统计,高峰时期该校仅篮球队就有46支。燕京大学则从1925年开始设立体育锻炼课,每周3节,连续3年,规定锻炼时间,将课外自主活动制度化安排。1931—1932年,燕京大学开展网球、乒乓球、滑冰、篮球、排球、中国武术、足球、羽毛球等20多种运动项目,平均每个学生参加4项由体育系批准并指导的运动项目^{[6]215-217}。在燕京大学,“有一种动力激励着所有学生们参加各种运动会、体育比

赛和个人锻炼”^{[1]5}。显然,参加体育活动已成为学生的自觉自发行动,统计数据也佐证了燕京大学的体育普及程度,1931—1932学年,燕京大学在校男生总数578名,而参加校内比赛、校际比赛、公开比赛、个人锻炼的男生则分别达到22338、8715、11820、40870人次;在校女生总数为233名,参加校内比赛、校际比赛、公开比赛、个人锻炼、课堂课程的女生也分别达到4117、208、156、10446、12754人次^{[6]215-217}。可见,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频次相当高。

(3)体育课程教学阶段。体育教学阶段是教会大学体育从非正式转向正式、从非结构化转向结构化的重要标志,它以体育的课程化、学分化为显著特征,设置体育必修学分。燕京大学对体育教学工作进行大胆探索与实践创新,其做法有一定历史价值。

设立体育教学机构。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性,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募资建造完备的体育场馆。校友和社会人士评价其“可与美国本土的大学相媲美”。完备的场馆为开展体育教学、设立教学机构创造有利条件。圣约翰大学于1920年设立体育室,并于1921年成立体育部,设有专职体育教员,负责学生体育工作。燕京大学先于1924年设立“卫生体育部”,后于1925年改称“体育部”,1930年正式成立体育系,为全校学生开设各类体育课程,组织体育教学^{[7]76}。据《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之概况》统计,当时设置体育系的基督教大学共有两所,分别为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这说明,燕京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体育教学机构的大学,对其他教会大学起到引领作用,也对公立大学产生示范效应。

开设体育课程。“教会大学给中国带来的一大革新是引进了体育课”^{[10]73}。燕京大学于1927年正式将体育列为学生必修课,学生须修满两学年,后延长为3学年,使燕京大学成为当时体育学时最长的大学。学生“未经体育部证明修满体育学分者不得毕业”^{[7]73}。校友钱家钰说:“燕大体育课要求相当严格,不论任何一项不过关,都是没完成体育课任务,不能毕业。”^[16]据燕大校友回忆,课程不合格的学生需每周回校补修体育课程,直至合格才能领取毕业证书,课程修读要求相当严格。圣约翰大学最早于1921年开始实施两年强迫运动制度^{[13]45},该校学生无论男女必须修满4个学分才能毕业。圣约翰大学比燕京大学更早普及体育锻炼,但体育课程的学时则较燕京大学短。

燕京大学对女子体育课程的探索极具代表性。1899年圣约翰大学顾斐德参加“基督教中国教育会”3年会议时指出,“由于中国女学生的健康问题很突出,所以在发展智力的时候也要发展身体,而柔软的

体操是最合适的，如果再加上音乐就再好不过了”^[17]。说明圣约翰大学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女学生的健康问题，但因女生人数较少，该校女子体育工作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燕京大学合并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后将其设为女部，女部从1922年起配备专门的体育老师。燕京大学的女子体育教学实践独具特色：其一，开设以舞蹈为基础的女子体育课程。该课程包含舞蹈、单人运动、团队运动和体操运动四大系列^[178]，每个系列设有若干项目，学生每学期任选一门，在学期间不得重复。舞蹈作为女生体育课程在燕京大学得到广泛开展，增强女生的体质和艺术修养。其二，较早关注女生形体美学，该校首创女生“体态矫正课程”。卢惠卿担任燕大女部体育主任之后，对新入学的女生统一进行体型测试，照体侧姿势像，观察坐、立、行走姿势，如有脊椎弯曲、驼背、两肩高低不平或平足、扁足等，编入矫正班接受矫正训练^[174]。矫正方式包括器械练习，徒手体操、行走姿势训练等，还配有专门形体室。燕京大学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实施女性形体矫正训练的大学，其女子体育课程具有专业性和前瞻性，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重视教学辅助工作。为配合体育教学工作，燕京大学重视做好课程辅助工作，包括学生体质监测与分类训练项目。燕京大学体育系拥有较为雄厚的师资，代表性人物包括黄国安、赵占元、卢惠卿等。赵占元在该校设计学生“体能卡”，内含学生身高、体重、肺活量、握力、拉力等体质状况，每学期测一次，便于学生了解自身体能^[18189]。实行学生体能检查制度，及时掌握学生身体状况，并据此制订基本训练、专项提高的分类体育课程，同时为身体残障学生开设“减轻组”课程，确保全员参加，动态监控，针对性地加强训练和锻炼，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学生体质监测与分类训练为学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起到铺垫和辅助作用。燕京大学的学生体质监测与精细化管理、分类训练走在当时国内高校的前列，说明该校的体育工作关注每一个学生，体现差异化和针对性，符合因材施教的体育原则。

2 体育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1)对教会大学自身的影响。

(1)提高学校生存能力。吸引生源和确保办学经费是教会大学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学生学费和国内民间捐赠逐渐成为教会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属于高收费的贵族学校，一般家庭难以负担其学费，入读的学生多来自达官显贵家庭，这些学生毕业

后打算出国或进入洋行的不在少数。因此，开展西式体育运动不仅有助于培养身心健全的学生，对学校生存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有助于吸引当时向往西式生活的官僚及富商家庭子弟，既确保学校生源，也能争取学生家长的捐赠，还能帮助学生提早适应西方生活方式。这可以部分解释两所大学热衷组织体育活动和参加体育竞赛的动因。

(2)改善学生学业表现。体育运动有助于养成学生的运动习惯，磨炼意志品格，进而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并最终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燕京大学校董颜惠庆在该校毕业典礼上说：“体育文化非常重要……培育了我们所缺少的一些品质，包括创造精神，决断能力，纪律和面对失败的勇力。”^[61220] 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养成了燕京人公平竞争、团队工作的“运动员精神”，磨炼了学生坚韧不拔、拼搏进取的意志品格。《燕京大学史稿》曾这样描述两者的联系，“燕京人所取得的成就，跟他们坚韧不拔、拼搏进取的运动员精神是分不开的”^[18188-197]。燕京大学曾在1931—1932学年对学生体育运动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参加运动的男生超过男生学业平均成绩，经常参加运动的女生也超过女生学业平均成绩^[61217]。无独有偶，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均表现出较高的办学水平，是当时我国办学质量最高的教会大学，两所大学的毕业生均具备直升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资格，其中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称“北平四大名校”，是我国当时少数具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大学，毕业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大师、名家，其中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人及“两院”院士50多名；圣约翰大学也曾享有“东方哈佛”的美誉，培养出了顾维钧、陶行知、陈鹤琴、林语堂、贝聿铭等一批名家。两所大学优异的办学业绩与他们普及开展体育对学生造成的正面影响不无关联。

2)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影响。

(1)推广体育运动。教会大学承继西方教育传统，最早将西式体育引入中国。圣约翰大学率先引入田径运动，最早开展足球、网球、棒球运动，还引进了乒乓球、赛船、拳击、垒球、击剑等10多项西式体育项目^[19]。燕京大学同样大力推广校园体育，开展的体育项目多达几十项，其中羽毛球、板球、冰上运动都是燕京大学率先引进的。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是我国当时校园体育最为活跃的大学，在各类体育社团的推动下，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带动本区域其他高校开展体育运动和竞赛，正如穆恩^[201356]所言：“在教会大学影响下，网球、棒球和足球运动得到普遍开展，而且逐渐被引进到官立学校。”因此，教会大学扮演中国大学

体育运动“桥头堡”角色,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策源地,带动西式体育运动的普及。

(2)促进竞技体育发展。我国最早的竞技体育源自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在我国早期竞技体育中发挥主导作用。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建立学校体育队的大学,竞技体育成绩突出。1911年该校网球队在中华民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了优异成绩;1913年圣约翰大学运动员参加了第1次远东运动会,在中国队所得的40分中有26分为该校学生所得;1914年该校田径队获得华东大学第1届田径赛冠军;之后,圣约翰大学的“飞梭”羽毛球队摘得上海羽毛球甲级联赛锦标;1918年圣约翰大学篮球队获华东大学篮球比赛冠军,并代表上海队获得第6届远东运动会亚军;1948年该校排球队参加全国排球赛获得第1名^{[20]78}。可见,圣约翰大学是我国早期竞技体育的参与和主要推动者。燕京大学是我国最早组建棒球队、冰球队的大学,其篮球队也是华北地区明星球队,为我国国家篮球队输送了王平周、邓华耀、苏学良、周宝恩等队员。

(3)培育体育精神与品格。因学生缺乏体育精神,早期校际体育比赛的开展并不顺利。运动员过分看重比赛结果,因担心受到外界指责而拒绝参赛或临阵退赛,团队合作精神缺失等现象比较普遍。燕京大学体育系创始人黄国安致力于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和品格,并将其视作自己能为国家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在黄国安等人的努力下,燕京大学校园逐渐形成与体育竞赛相匹配的“运动员精神”,公平竞争、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团队合作的“运动员精神”逐渐在学生群体中扎根,并传播到华北地区的高校^[21]。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曾对校内体育运动提出了8条规则,即“运动会有其宗旨;比赛应遵守规则;比赛要保持谦虚、待人友好;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由裁判决定胜负;尊重胜利者,不嘲笑失败者;不计较输赢;取得成绩后不能自负”^{[8]115}。圣约翰大学的“八条规则”与燕京大学的“运动员精神”对培育学生体育精神与品格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影响由内及外,辐射到所在区域的其他高校,留下了宝贵体育遗产。

3)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1)培养高校体育人才。燕京大学于1924年筹建体育部,选派黄国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体育,他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体育博士。之后,该校又先后选送林启武、卢惠卿分别赴美国研修体育。林启武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教育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元勋,被授予国家“体育运动一级奖章”^{[7]75},曾获“全国优秀体育裁判”,获得国际和国家最高体育奖励^{[7]77};卢惠卿先后获美国威斯利女子学

院体育硕士学位、哥伦比亚体育博士学位,成为继金陵女子大学张汇兰之后我国第2位女性体育博士。圣约翰大学则选送沈嗣良、马约翰赴美国研修体育。沈嗣良后来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曾任我国奥运代表团团长,是著名的体育活动家。圣约翰大学校友马约翰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体育系主任,成为知名的高校体育专家。来自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黄国安、赵占元、卢惠卿、林启武、沈嗣良、马约翰等人是我国高校系统学习西方体育理论先驱,为培养体育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管玉珊、张汉槎、周宝恩、邓华耀、管玉琳、吴佩琪、沈立义等后来都成为我国高校体育中坚力量。

(2)加快高校体育课程的探索步伐。如前所述,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我国较早开设体育必修课的教会大学,引领了体育课程化的潮流。燕京大学对体育课程的探索更为系统,按基本训练与专项提高的思路设计学生体育课程,做好与体育教学有关的辅助工作。如实施学生体格检查,开展学生体能监测,并根据学生身体状况设计“提高组”和“减轻组”课程。女子体育方面,燕京大学借鉴金陵女子大学“女子服务社会需健全体魄”的教育观,要求女生必修体育3年,摸索出一套包含“舞蹈”、单人运动、团队运动和体操运动在内的模块化、系列化女子体育课程,开创女生“体态矫正课程”,其男女有别的差异化体育思想具有合理性,女子体育观有较强的专业性。燕京大学女子体育课程为我国高校探索女子体育积累宝贵经验,在课程教学方面缩短我国高校体育的探索历程。

(3)转变高等教育观念。中国传统教育更加尊崇“健全的精神”,追求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改造,而忽略身体机能的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曾说过:“如果我们能教给中国学生不以体育锻炼为耻,造物主造就了他就是为了让他有一副强健的体魄,那我们就赢得了重要的一分”^{[4]26-27}。卜舫济认为,体育有培养高尚人品的重要职能,“中学及大学之中……运动一事,尤为有益……皆足使人品高尚。”将竞争性、团结协作,以及“尚武”精神引入大学校园^[22]。顾斐德曾这样描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及学生:“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操场便因活动的学生而焕发生机……他们跑步、冲刺、喊叫,全然不像是中国人”^{[4]52}说明教会大学带来教育新气象,注入校园新文化。

参考文献:

- [1] 约翰·洛克. 教育漫话[M]. 徐大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 [2] 李雪峰. 清末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大学体育教育[C].

体育文化遗产论文集, 2014.

- [3] 熊月之, 周武. 圣约翰大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4] 费玛丽. 圣约翰大学[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
- [5] 王耀文. 近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体育运动初探[J]. 兰台世界, 2015(5): 32
- [6] 艾德敷. 燕京大学[M]. 刘天路,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
- [7] 唐慧珍, 胡冬生. 燕京大学的体育教育, 燕京大学史料选编[Z]. 1997(4).
- [8] 徐以骅.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9] 高时良. 中国教会学校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89.
- [10] 杰西·格·卢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M]. 曾钜生,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 [11] 杨仲达, 李琦琳. 近代华北冰上体育运动的发展[EB/OL]. (2022-02-18)[2022-11-20]. http://www.zgdazxw.com.cn/culture/2022-02/18/content_330791.htm
- [12] 马约翰. 谈谈我的体育生涯[G]//马约翰纪念文集[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148.
- [13] 郑朝强. 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Z]. 文史资料选辑. 第91辑.
- [14] 施扣柱. 圣约翰大学: 引领校园体育文化之新潮[J]. 上海教育, 2017(4): 87-90.
- [15]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学校通报[N]. 1932-11-26.
- [16]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燕大文史资料[Z]. 第3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411.
- [17] COOPER F C. Physical training[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9: 71-73.
- [18]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 燕京大学史稿[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 [19] 王丽娜, 李勇彬. 圣约翰大学体育发展的历史考察[J]. 兰台世界, 2013(8): 78.
- [20] 穆恩. 体育训练在中国. 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Z]. 1912.
- [21] 司徒雷登. 原来他乡是故乡. 司徒雷登回忆录[M]. 杜智颖,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56-57.
- [22] 王秀强. 中国百年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18: 59.

